

分庭抗礼与互纳质子

——贵霜帝国与两汉关系的两条主线

王宏谋

(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 甘肃 天水 741001)

[摘要]月氏是中国古代西北的一个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后的大月氏,逐渐实现了生活方式由游牧向定居的转化,并建立了强大的贵霜帝国。在贵霜帝国与两汉的关系上,冲突对抗和平交往始终是相互交织的两条线索。不论是直接的军事交锋还是互纳质子都充分反映了其力量的强弱变化。探研贵霜帝国与两汉之关系对于处理大国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贵霜帝国 汉朝 纳质 西域

贵霜军队与中国的直接交锋,有明确的史料记载。

“初,大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奉珍宝、符拔、师子,因求汉公主。超拒还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大月氏遣其副王谢将兵七万攻超。超众少,皆大恐。超警军士曰:‘月氏兵虽多,然数千里逾葱岭来,非有运输,何足忧也?但当收谷坚守,彼饥穷自降,不过数十日决矣。’谢遂前攻超,不下,又抄掠无所得。超度其粮将尽,必从龟兹求救。乃遣兵数百于东界要道之。谢果遣骑齎金银珠玉以赂龟兹。超伏兵遮击,尽杀之。持其使首以示谢。谢大惊。即遣使请罪,愿得生归。超纵遣之。大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1]

作为两汉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张骞出使西域以后,汉朝和中亚的和平政治关系得以建立。到东汉初,中亚大部分地区已统一于贵霜王国的版图内。班超对大月氏的用兵,再次巩固了汉王朝在西域的统治优势。此后,汉与贵霜之间保持了相对和平的局面。然大月氏在西迁200多年后,能再次进攻西域,并“求婚”于汉,说明其力量壮大到足以和汉王朝分庭抗礼的程度。除军事上的对峙外,互纳质子是二者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自汉以来,西域诸国常遣子为质于中国,这在两汉史籍中不胜枚举。

“楼兰即降服贡献,匈奴闻,发兵击之。于是楼兰遣一子质匈奴,一子质汉。……征和元年,楼兰王死,国人来请质子于汉者,欲立之”。

“至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

“大宛王……遣子入侍,质于汉。汉因使赂赐镇

抚之。”

“宣帝时,乌孙公主小子万年,莎车王爱之。莎车王无子死,死时万年在汉,莎车国人计欲自託于汉,又欲得乌孙心,即上书请万年为莎车王。”

“顺帝永建四年,于闐王放前杀拘弥王兴,自立其子为拘弥王,而遣使者贡献于汉。”

“顺帝永建六年,于闐王放前遣使子诣阙贡献。”

“元帝时,莎车王)尝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勅诸子,当进奉汉家,不可负也。”

“二十一年冬,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

“永建二年,勇与敦煌太守张朗击破(焉耆)左侯元孟乃遣子诣阙贡献。”

“建武二十一年,与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还亡,乃附属匈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汉取伊吾卢,通西域、车师始复内属……和帝永元二年,大将军窦宪破北匈奴,车师震惧,前后王各遣子奉贡入侍,并赐印绶金帛。”

据《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记载,边疆各族纳质于汉朝的有南越、匈奴、鲜卑、乌桓以及车师、龟兹、莎车、大宛、康居、乌孙、鄯善、焉耆、拘弥等西域国。

在西域诸国纷纷遣子入质于中国的同时,汉天子也曾遣子质于外国。

《大唐西域记》^[2]卷一迦毕试条云:“大城东三四百里北山下,有大伽蓝,僧徒三百余人,并学小乘法教。闻诸先志曰:昔犍陀罗国迦腻色伽王,威被邻

国,化恰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伽王既得质子,特加礼命。寒暑改馆:冬居印度诸国,夏还迦毕试国,春秋至犍陀罗。故质子三时住处,各建伽蓝。今此伽蓝,即夏居之所建也。故诸屋壁图画质子容貌服饰颇同东夏。其后得还本国,止有故房,虽阻山川,不替供养。故今僧众每至入安居解安居,大兴法令,为诸质子祈福树善,相继不绝,以至今”。

卷四至那仆底条又云:“昔迦腻色伽王御宇也,声振邻国,威被殊俗。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伽王既得质子,赏遇隆厚,三时易馆,四兵警卫,此国则质子冬所居也。故曰至那仆底。质子所居,因为国号。此境已往,泊诸印度,土无桃李,质子所植,因谓桃曰至那你(注云:唐言汉持来),梨曰至那罗阇弗但逻(注曰:唐言汉王子)。故此国人深敬东土。更相指告语,是我先王本国人也”。

此外,《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也提到,迦毕试国“有一小乘寺名沙落迦,相传云是昔汉天子子质于此时作也。其寺僧言:‘我寺本汉天子而作,今从彼来,先宜过我寺。’法师见其殷重,又同侣慧性法师是小乘僧,意复不欲居大乘寺,遂即就停”。^[6]

从这几段材料来看,在迦腻色伽统治时期,中原王朝(之西北地区)曾经向贵霜帝国送过质子,并且还居住了相当一段时间。冯承钧先生认为,东土送质子之国是疏勒,“质子”乃是疏勒王之舅臣磐。适当东汉安帝元初年间,即公元二世纪初。^[7]冯的依据是《后汉书》卷118疏勒传的记载,从而断定质子于贵霜者当为疏勒。其文曰:安帝元初中(107—120年)疏勒王安国以舅臣磐有罪,徙于月氏,月氏王亲爱之。后安国死,无子,母持国政,与国人共立臣磐同产弟子遗腹为疏勒王。臣磐闻之,请月氏王曰:“安国无子,种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遗腹叔父也,我当为王。月氏乃遣兵送还疏勒,国人素敬爱臣磐,又畏惮月氏,即共夺遗腹印绶,迎臣磐立为王。更以遗腹为磐陀城侯。后莎车畔于阗、属疏勒。疏勒以强故,得与龟兹于阗为敌国焉。顺帝永建二年(127年)臣磐遣使奉献。帝拜臣磐为汉大都尉,兄子臣勲为守国司马”。冯先生认为,“臣磐前后有无他人质于贵霜,史无明文,而疏勒王族徙贵霜者只此一见。余疑玄奘所闻建沙落迦寺之质子或即此人。”^[8]林梅村先生则将汉送质子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他说:“古代中国以发源于昆仑山的和田河为黄河之源,所谓‘河西蕃维’显然指和田河流域的于阗及其以西莎

车、疏勒等国”。^[9]由此可以推断,中原王朝纳质于外确是不争的事实。

一般而言,纳质制度只存在于边疆少数民族和汉中央王朝之间,而且多是前者纳于后者,中原王朝纳质于外国者很少。然互纳质子,从本质上讲,是政治、军事上的统治策略,是双方在不同时期力量对比强弱的反映。

少数民族的纳质,主要是迫于中原王朝的军事压力。质子的出现不仅与中原王朝的征伐有关,而且和西域诸国内部势力消长等因素有关。“都护建立以后,属国纳质,更被确定作为一种经常制度”。^[10]然汉王朝纳质于外,是有其深刻历史背景的。一是汉廷要利用质子的特殊身份对其进行有效的统治,二是汉廷要减轻经营西域的经济负担。

傅介子刺杀楼兰王安归后,汉扶立尉屠耆为王,尉屠耆是公元前92年入质于汉廷的,公元前76年归国继王位,在汉长达16年。从他开始,汉利用质子王位继承人的身份,积极扶立亲汉的西域国王,包括龟兹质子白霸(91年扶立)、焉耆质子元孟(94年扶立)、车师后部质子卑君(153年扶立)、拘弥质子定兴(175年扶立)。在这个阶段,汉认识到质子可能成为王位继承人,而加以重视,不轻易刑杀之。随着匈奴势力的衰落,汉即禁止其接受西域质子。公元前5年,乌孙翁侯援质于匈奴,汉遣使“责让单于,告令归还卑援质子”。^[11]单于受诏,遣归。这是汉廷统治西域积极举措的一个典型例证。

同时,在汉王朝由盛转衰之后,统治阶级的穷奢极侈,官僚机构的膨胀和镇压人民反抗的费用日增,使两汉财政更趋紧张。于是,朝中一再兴起是放弃还是经略西域的争论。质子政策的推行可以缓和这种矛盾。即汉朝在西域保有一定军事力量的前提下,借助于质子政策,进可以扶立质子,建立亲汉政权,退可以挟质要挟在位诸王服从都护(西域长史),遵汉意旨,诸国一旦叛变,可以先没入其质子。质子政策似乎成了代价极小,而收获极大的统治方法。

西域诸国向汉王朝纳质,对改善二者之间的关系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安作璋先生认为:“一般说来,质子回国后,对于汉朝印象都是好的,国际关系反而因此更为密切”。^[12]但从实际情况看,并非完全如此。他们更多的则是基于对自身势力和地位的考虑之上的。尉屠耆在汉16年,不可谓不长,即鄯善王位后,也确实长期亲附汉朝。这其中颇有奥妙可言:一是他在国中势力单薄,考虑到“前王有子

在“恐为所杀”,于是要求汉遣将屯田;二是因为敦煌郡西邻白龙堆,烽燧直抵盐泽,汉廷易于以武力控制鄯善。^[10]莎车王延(汉和帝时质子)教儿子当“世奉汉家”,是因为当时西域处于匈奴势力笼罩之下,莎车希望借汉的支持来保持独立。一旦强盛起来,匈奴之患轻而汉未授以西域都护之印,莎车王对汉怀恨在心。^[11]班超扶立的龟兹质子白霸,在汉17年多。公元105年和帝死后,西域诸国叛变,围攻都护,白霸不顾吏人反对,迎梁懂入城,引起“龟兹吏人并叛其王,而与温宿、姑墨数万兵反,共围城”。^[12]这件事说明,当汉在西域的力量衰落时,即使国王有向汉之心,但国人并不允许。

还有些质子虽是汉廷所扶立,但是在汉势力退出西域后则往往反叛。焉耆王元孟就是这样的人物。他也是班超扶立的,超还曾留焉耆半年慰抚之,和帝死后,他就背叛了。此外如疏勒王忠(非质子)也曾攻打扶立他的班超。

考察两汉质子政策的推行经过,我们不难发现,西域诸国是否遣送质子,质子回国继位后是否亲汉,是由汉在西域的势力、匈奴与汉的力量对比、西域国家的强弱等诸多因素为后盾的。桑弘羊就说:“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矣”。^[13]

桑弘羊等人所代表的是西汉务实派大臣,他们习于边事,以建功为第一目标。而朝中一批儒士出身的官僚之所以赞成质子政策,可能是受到了春秋以来葆质传统的影响,这一传统源于西周礼制。质,原是西周贵族相见时所持的礼物,表现出宾主之间的政治关系。当时文献中也有了国家之间交换人质的记载,“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14]“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15]在秦律中有关于葆子的专门条文。汉代,葆质制度主要行于边郡,武帝时期由于对外战争频繁曾恢复保宫制度,以拘押出征将士亲属,宣帝时废。汉儒遵循这一传统,称周边诸国臣属于汉是“万方绝国之君奉贄献者”。^[16]董仲舒则建议对匈奴行质子政策,“质其爱子以系其心”。^[17]这是汉推行质子政策的主导思想。

西域诸国的纳质和汉质子于贵霜有很大的区别。其一,历史背景,殊途同归。质子现象的出现,都是在被纳质国与纳质国之间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发生的。两汉王朝的纳质大都发生在王朝兴盛之时;迦腻色伽统治时期正值贵霜王朝的鼎盛时期。如果我们把质子问题看作各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筹码的话,那么,质子问题正是强国外交的集中

体现。其二,纳质动因,各有千秋。西域诸国纳质于汉,正如前文所及,乃迫于汉之威慑和压力也。汉天子质于贵霜,可认为是汉天子出行在外的一次短暂旅程,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质子性质。大月氏源于中国,尽管到迦腻色伽统治时期已时隔三百多年,对于汉王朝的情况还是了解的,对于汉廷太子,绝不会怠慢的。从前文所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相关内容看,贵霜对汉天子的态度还是相当友好的,“我寺本汉天子而作”,这种非凡的礼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其三,纳质主体,不尽一致。西域诸国遣子为质,其纳质主体当不再论。然史籍所载汉纳质之地“河西蕃维”,不论是疏勒,还是疏勒及其周围一带,当时都在两汉政权的控制之下。“无论帕米尔东西,对所谓中原王朝的向往都未尝中断,或遣使奉献,或遣子入侍,或接受册封,总之是不拘形式,保持联系”。^[18]由于汉朝纳质主体相对于西域诸国来说是灵活多变的,因而将“河西蕃维”之质子认为是汉天子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参考文献:

- [1]《后汉书·班超传》。
 - [2]唐玄奘撰,芮传明译注《大唐西域记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62页。
 - [3]唐慧立、彦惊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年,35页。
 - [4][5]冯承钧:《迦腻色伽时代之汉质子》,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101页。
 - [6]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190页。
 - [7][9]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61页。
 - [8][17]《汉书·匈奴传》。
 - [10]马雍:《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和敦煌郡的西境》,载《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11—15页。
 - [11]《后汉书·西域传》。
 - [12]《后汉书·梁懂传》。
 - [13]郭沫若校订《盐铁论读本》,科学出版社,1957,81页。
 - [14]《左传·隐公三年》。
 - [15]《史记·秦始皇本纪》。
 - [16]《盐铁论·崇礼》。
 - [18]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2页。
- 作者简介:王宏谋(1976—),男,甘肃灵台人,史学硕士。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和古代中外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